

改革——中国的必须选择

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 乔新生

老木按：2013年11月15日，联合早报网发表了中南财经政法大学廉政研究院院长乔新生的文章，对中国的改革进行了个人评论，乔文认为行政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切改革的总开关。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重大经济改革必将出现严重的变形，改革会走向它的反面——非但不能巩固执政党地位，反而使政权变得岌岌可危。文章既对中国的改革充满了信心，又对中国以往和未来的改革提出了种种个人的见解，希望读者们自行品鉴。文章标题为老木所加。

按照中共的章程，中共换届选举之后召开第一次中央会议，主要确定中共的领导人；第二次会议主要确定国家政权机关的领导人，第三次会议才确定国家的大政方针。因此，人们有理由对中共第十八届三中全会作出的各项决议抱有期望。

然而，中共每一次三中全会制定的改革路线方针政策，在实施过程中都会打折扣，这一方面是因为中共颁布实施的改革政策，与公众期望存在着一定的距离；另一方面则是因为中共的改革旨在巩固自己的执政地位。因此，当改革涉及到既得利益的时候，一定会停滞不前。例如中共建议制定高等教育法，扩大高等教育机构的办学自主权，全国人大常委会制定的高等教育法虽然早已颁布实施，但高等教育机构的自主权却在不断地缩小，原因在于改革触及到了教育行政主管部门的利益。当初为全国高等院校确定行政级别，是为了更好地管理高等院校，可是却导致高等院校的行政化更加严重。

笔者曾组织两岸的学者讨论新闻传播法律制度的研讨会，由于在邀请台湾学者的过程中，没有征求学校台湾事务管理部门的意见，结果导致障碍重重。高等院校之所以要设立台湾港澳事务管理机构，就是要加强对高等院校在这些事务方面的监控。这不仅严重干扰正常学术交流，且侵蚀了学校的教育资源，官僚为了显示自己的存在，不断地

制定各项规章制度，使大学教授步履维艰。这充分说明在中国既有真正意义上的改革，也有打着改革幌子维护既得利益的“改革”。部分经济学者早就意识到改革所面临的深层次问题，呼吁在充分照顾既得利益的基础上，以政策赎买的方式推动改革。现在看来，由于既得利益集团已经将自己的利益法律化，执政者提出的各项改革不可能产生立竿见影的效果。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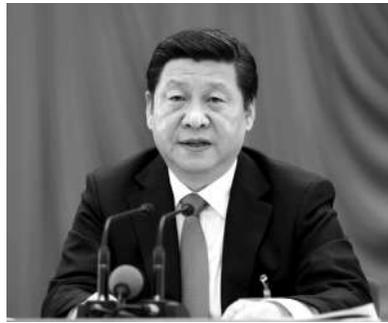
中国改革开放的历史经验教训表明，对改革政策必须“听其言观其行”。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的确为中国走向市场经济铺平了道路，然而，由于价格改革留下了巨大的隐患，出现了许多垄断集团，因此，后来的改革问题重重。1990年代的所有制改革，造成国有资产大规模流失，少数权贵阶层人士因参与国有企业的改革而成为富豪，而国有企业的职工却因为失去工作岗位陷入困境。

本世纪进行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试图打破传统的利益分配格局，人力资源和社会保障部门推行的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想要通过提高城镇职工的退休福利待遇，逐步缩小居民的收入分配差距，然而触及到国家机关工作人员利益，改革出现了严重的变形。学术界讨论的“延迟退休”方案，实际上是在增加城镇职工负担的基础上，消化中国退休养老保险制度改革所积累的问题，普通退休职工又一次承受着中国改革的阵痛。



中共提出的每一项改革措施，都旨在进一步强化执政能力，巩固执政地位。中共意识到实现社会公平正义的重要性，试图通过改革提高中国居民的经济和社会地位。但是，作为世界上最大的执政党，中共在改革中

所面临的首要问题，不是如何提高居民的福利待遇，而是如何化解党内不同利益之间的矛盾问题。1980年代的价格改革，使得中国走上了市场经济的不归路，1990年代的所有制改革，为中国建立市场经济提供了可能性，进入本世纪的收入分配体制改革，则使得社会各个利益阶层之间的矛盾进一步公开化。



十八届三中全会试图摒弃以往的改革思路，通过发展经济，大幅度提高生产力水平，缓和社会矛盾，解决改革中所面临的问题。换句话说，中共试图以改革来解决改革中的问题。这当然是一种解决问题的思路，也是不得已的路径选择。然而，这样的路径选择同样面临着既得利益集团的相互掣肘，不可能一帆风顺。

中共提出简政放权，转变政府职能，改革直接面向自己，面向庞大的执政团队，以及他们背后更为庞大的利益集团。不过，在简政放权的过程中，权力者一定会通过各种方式，把名义上失去的利益重新收回来。每年数以百万计的公务员考试大军，不仅昭示着体制既得利益的现实利益有多么诱人，同时也预示着这场改革很可能会无疾而终。1990年代国务院提出的机构改革方案，虽然减少了国务院的职能部门，却没能减少国务院的工作人员，虽然减少了国务院职能部门的办公经费，却没能减少国务院整体的财政开支。当改革的方针政策出自国务院行政机关，而不是全国人大的时候，行政体制改革一定会变成形式主义。当前中国改革所面临的最大问题，就在于出现了严重的路径依赖，行政主导的改革根本无法达到预期的目的。只有把行政主导的改革，逐步转化为公民主导的改革，通过人民代表大会制定各项改革方针政策，改革才能步入正轨。

中国的改革从来都分为两类：面向执政者自己的改革和面向大众的改革。1980年代

的改革实际上是公众自发的改革，中共只不过是确认了改革的成果而已。1990年代改革则是政府主导的改革，这场改革面向的是大众，却制造了大问题。虽然经济保持了高速增长，但由于是政府投资拉动的，必然导致权力不断扩张。无论是分税制改革还是国有企业海外包装上市，都是在不断扩大中央政府的宏观调控权，进一步压缩市场主体生存空间。十八届三中全会试图把改革的方向对准自己，通过自我约束权力，实现真正意义上的改革。如果抱有诚意，这些改革方针政策贯彻落实下去，中国的面貌就会焕然一新。

面向自己的改革是异常痛苦的。国务院提出在上海建立自由贸易试验区之后，国务院各个部门都提出了自己的方案，无论是中国人民银行的金融改革方案还是商务部的负面清单，都与公众的期望相距甚远。会出现如此局面，根本原因就在于庞大的既得利益集团，国务院各个部门实际上已经成为各个利益集团的代言人，他们充分利用政策的制定权，维护既得利益。国务院领导人显然已经意识到问题的严重性，试图通过技术性的改革，解决经济体制改革产生的问题。如果改革涉及到党内的人事布局问题，涉及国务院各个职能部门的改革问题，这场改革很可能会被扭曲，很难达到预期的目的。

行政体制改革或者政治体制改革是一切改革的总开关。不进行行政体制改革，真正落实主权在民的原则，重大经济改革必将出现严重的变形，改革会走向它的反面——非但不能巩固执政党地位，反而使政权变得岌岌可危。

本届三中全会能否在政治体制改革方面迈开坚实的步伐，能否在涉及到既得利益的问题上向全国人民作出郑重的交代，能否在法律的引导下吐故纳新，进行真正意义上的自我改革，人们还需拭目以待。当一些学者对中国的经济成就津津乐道的时候，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居民长期付出的低工资、低福利的沉重代价，他们似乎忘记了中国正面临着贫富差距两极分化的严酷现实。中国的这场改革实际上是中共自身的改革，改革成败的关键在中共，改革的结果却让全体中国人民承受。中国人有理由对中共给予更大的期望，说到底，改革就是一个利益的分配问题，而政党本身就是一个既得利益。中国人应该学会从发展的角度思考问题，要求中共把一切改革方针政策，纳入宪法和法律的框架内，依照宪法和法律规定的程序，不断地寻求共识并且凝聚共识，只有这样才能让中国的改革惠及普通民众。

十八届三中全会公报9处新提法及点评

11月12日中国共产党第十八届中央委员会第三次全体会议在北京闭幕。会议公报中出现了诸多新提法，人民网梳理了九处新提法及专家、媒体点评，老木将相关内容进行了摘录，以帮助读者朋友对三中全会的理解。

一、“推进国家治理体系和治理能力现代化”

国家行政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许耀桐：

过去我们讲国家和社会的关系、和人民的关系，最早是国家统治，后来讲国家管理，现在我们确立了国家治理。统治就是我强你弱，我是统治者，我管着你、管着社会。后来用的“管理”也有管的意思，我管着你，你要听我的。现在用治理，治理是一个新的词汇，现在在全球也是比较流行的。它强调多主体，大家都是主体。国家管理者是主体，人民也是主体，还有各组织、各单位，都是参加管理的主体之一，所以这是从过去的一个主体变为多主体。

国务院发展研究中心宏观经济部研究员张立群：

治理现代化就是要更加科学、更加民主，同时也要更制度化、规范化、程序化。这都是我们现代化的含义，不受过去传统的那种生硬的、干巴巴的，或者是非常强硬的方式，向科学、向民主、向制度更好的转化、移动。

二、“经济体制改革是全面深化改革的重点，核心是处理好政府和市场的关系，使市场在资源配置中发挥决定性作用和更好发挥政府作用”

人民日报社论：

这是《决定》提出的一个重大理论观点。发挥经济体制改革的牵引作用，推动生产关系同生产力、上层建筑和经济基础相适应，推动经济社会持续快速健康发展，这一鲜明思路，体现了我国长期处于社会主义初级阶段这个最大实际，也契合发展仍是解决我国所有问题的关键这个重大战略判断。

三、“加强顶层设计和摸着石头过河相结合”

人民日报：

改革是复杂的系统工程。当改革打响攻坚

战，迫切需要把顶层设计和基层创新结合起来，在摸石过河中把握规律，在统筹规划中推进改革。强调顶层设计，是改革的大局观。尊重基层首创，是改革的群众观。“摸着石头过河和加强顶层设计是辩证统一的”，十八大以来，上下的呼应，最大程度聚合着改革正能量，激发了中央和地方、政府和社会的积极性创造性。

四、“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

中国社科院金融研究所所长王国刚：

说公有制经济和非公有制经济都是社会主义市场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放到了同等重要的位置上。由此体现了我们前面所讲的市场机制的决定性作用，因为市场机制是讲公平的，在市场中各个主体的竞争是公平状态，而不能有政策上的歧视。在同一市场中，因为你是国有的，所以，政策上扶持你；然后你亏损了，后面可以不断地有财政补贴。而非公经济我和你竞争，我亏损了自担。这种竞争就不应该了。所以，这回讲要公平。这次如果要讲亮点的话，它的亮点就强调在这两类的公平上。

五、“科学的财税体制是优化资源配置、维护市场统一、促进社会公平、实现国家长治久安的制度保障”

国家开发银行研究院副院长、中国社科院金融所金融市场室主任 曹红辉：

阐明了财税体制的本质和目的，明确了它的政治职能、社会职能、经济职能，相当于指明了财税体制改革的目标。

六、“改革税制、稳定税负”

财政部财政科学研究所所长贾康：

营改增的全面推进已开启了中国新一轮财税改革，下一步税制改革还应包括优化政府收入结构与税制结构、完成增值税改革、改革个人所得税、改革和强化房地产税等多个方面。稳定税负指的是稳定宏观税负，由于经济总量的增加，要稳定宏观税负就需要继续进行结构性减税，两者是齐头并进的。



所金融市场室主任 曹红辉：

此处的改革必须和政府职能转变改革相配套，事权的重新划分不仅包括一部分上收中央，一部分划归地方，还将有一部分交给社会中介组织。我们不能重复过去“一放就乱，一收就死”的简单二元管理法，要纳入更复杂的规则，也要相配套。

八、“赋予农民更多财产权利”

中国社会科学院城市发展与环境研究所副所长潘家华：

让农民拥有更多的财产权，就要有这样一种尝试，让宅基地、农民的自留地、农民的承包地能够以某种形式在市场上流转，形成这样一种收益，能够保障农民的生活，因为土地是农民的生活和生产资料。

九、“建立更加公平可持续的社会保障制度”

对外经济贸易大学公共管理学院副教授李长安：

可持续是首次放在“社会保障制度”之前，不仅仅是只社会保障基金的可持续性，还包括了公平以及保障资金效率的可持续性。

(来源：人民网)

1.“首先不能愤怒。政治运动成功的关键在于找到同道者，而不在于发现不同道者。”

共和党领导人已经开始反思它的“造反式”风格。犹他州茶党(Tea Party)参议员迈克·李(Mike Lee)上周如是评论。导致美国政府上个月关闭的带头人物，是脾气火爆的德州参议员特德·克鲁斯(Ted Cruz)，他还推动了种种旨在驱除温和派共和党的“政治迫害”。因此，很重要的一点是，李和其他保守派领导人必须赢得这场“性情之争”。过去，他们共同的英雄罗纳·里根(Ronald Reagan)就曾证明，保守主义也可以是阳光而乐观的。对一个政党而言，咆哮着吼出“社会向上流动性”，是件很滑稽的事。

2.“香港行政长官必须由中央人民政府任命，对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区负责，这就决定了行政长官必须由爱国爱港人士担任。换句话说，与中央对抗的人不能担任行政长官。”

香港将于2017年普选特首，但具体的选举办法仍未出台。正在香港访问的中国全国人大常委会副秘书长兼《基本法》委员会副主任李飞，11月23日受香港政务司司长林郑月娥邀请出席午餐时，首次公开谈及中央对香港普选事宜的看法。

3. 湘西老人不识习近平，问“怎么称呼您”。

这条新闻，乍一看有点好笑，可是仔细想想，这位老人确实没受到当地干部的“临时培训”，习近平确实看到了“原汁原味”的特困户。在施齐木家，习近平看到了两位老人睡觉的小木房，揭开了两仓盖子，还走进猪圈看了看老人养的两头猪。一盏节能灯是唯一“电器”，家里连电视机都没有，也难怪老人“不识”总书记。

有意思的话